

Article

<https://doi.org/10.70731/5eqdbg42>

An Exploration of Ma Zhu's Elucid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through The Guide to Islam (Qing Zhen Zhi Nan)

从《清真指南》管窥马注对儒家思想的阐发

Puchun Liu ^{a,*}

^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Keywords:

The Guide to Islam (Qing Zhen Zhi Nan); Ma Zhu; Islamic-Confucian Dialogue/Convergence; Interpreting Islamic Scriptures Through Confucianism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Guide to Islam (Qing Zhen Zhi Nan) and incorporating previous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shaping Ma Zhu's thought prior to his authorship of The Guide and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elucidations of Confucian ideas within the text. The study argues that Ma Zhu innovatively reinterpreted the Confucian description of ontological origins, expounding upon the concepts of "Heaven" (Tian) and the "Sage" (Shengren)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This reflects the idea of "complementarity and mutual intelligibility between Islamic and Confucian thought", which still holds inspiration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today.

关键词:

《清真指南》；马注；
伊儒会通；以儒诠经

摘要: 本文以《清真指南》的文本为基础，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对马注著《清真指南》前的思想的生成背景、《清真指南》中对儒家思想的具体阐发进行研究，认为马注创新了儒家对本源问题的描述，将儒家“天”“圣人”等概念的表述和关系做了阐发，体现了“伊儒互补互通”的思想，对当今的文明交流互鉴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1. 引言

马注（1640-1711），是明末清初我国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与王岱舆、马德新及刘智并称为四大汉文译注家，著有《清真指南》《经权》等书^[1]，在中国伊斯兰思想界具有较大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学界对马注的研究逐渐起步。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在马注的生平研究、马注“伊儒会通”思想研究、马注著作研究等领域形成了不少可借鉴、价值高的研究成果。就马注生平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以《清真指南》中的《郁

速馥传》为基本研究史料：白寿彝的《马注》^[2]系改革开放后向国内学界介绍马注生平经历较早的一篇文章；刘玉钊的学位论文《马注生平及思想研究》^[3]将历史学、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马注生平的研究中，厘清了马注的生平及重要历史事件；王建平的《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四）——中国穆斯林大学者马注之墓及印章》^[4]根据海外保存的相关资料，将此前学界尚未加以探讨的马注坟墓及印章作了介绍；胡玉冰的《清代云南籍回族学者马注生平新考》^[5]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马注生平中的几件历史事件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和澄清。除专题研讨外，许多相关的学术专著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kakiii@qq.com

也或多或少涉及马注生平的介绍,如白寿彝《回族人物志》中列有卷三十五《马注》^[6],对马注的生平有比较全面的总结、金宜久在《中国伊斯兰先贤——马注思想研究》^[7]也以一些篇幅专门介绍了马注的生平与学术活动历程、许淑杰的《马注思想研究》^[8]附有马注生平简谱,等等。

“伊儒会通”思想是近年来马注研究的热点领域。此前,学术界大多以“伊斯兰教与儒教(家)的交流、沟通与融合”^[9]为“伊儒会通”的具体定义,随着宗教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及文明交流互鉴视域的引入,“伊儒会通”的内涵有所拓展。正如季芳桐指出:“‘伊儒会通’是指发生于明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期的中国穆斯林先贤的文化自觉活动,其以译撰为特征,通过对于伊斯兰文化的汉语翻译,以期将外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从字面看似指伊儒两教的会通,实质是四教(伊、儒、道、佛)的会通。”^[10]在此背景下,对马注“伊儒会通”思想的研究也就不再仅仅局限在“伊儒”,而进一步拓展到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会通上,例如许淑杰《试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及马注对此的贡献》^[11]阐述了马注在伊斯兰教中国化大潮中“伊儒”的关系;郑文宝《回、儒传统伦理会通考略——以马注为例》^[12]在介绍回儒会通何以可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回、儒在本体论、人性论、人伦纲常等伦理方面的会通;姚文永《清初回儒学者马注对道教的认知》^[13]全面论述了马注对道教的认知,系统地介绍了马注的道教观,等等。

学术界对马注的著作研究多聚焦于《清真指南》的研究上。学者们就马注在《清真指南》中所体现的思想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析与研究,总体来说涵盖了许多方面,如李培振对《清真指南》中关于卫生保健的论述进行了考察^[14]、许建军介绍了《清真指南》中的认主独一思想^[15]、高占福探析了《清真指南》中的人道思想^[16]、金宜久根据《清真指南》,对马注关于“命”的主张作了具体解释^[17]。胡玉冰^[18]、金宜久^[19]等人还对《清真指南》版本流传问题及后人对《清真指南》的进一步阐发进行了研究。

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立足于《清真指南》文本,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材料,尝试对《清真指南》中马注思想的生成背景以及马注对儒家的本源、圣人表述等问题的具体阐发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

2. 马注思想的生成背景

2.1. 明末社会经济与思想的深刻变革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期开始出现,随自然经济逐渐瓦解而来的是传统“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民贵商贱”等传统伦理秩序开始逆转,许多士人群体选择“弃儒从商”,社会正在酝酿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就思想领域而言,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大背景下,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社会矛盾正在逐步激化,封建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伴随而来的是传统程朱理学的逐步僵化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物壮则老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然宋代以来儒家的训诂词章之学已经发展到了极致,那么取代理学的心性之学的出现则是必然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心学系统的出现。王阳明以自己格竹“劳神成疾”,试晦翁以外就内之学的失败实践,得出“自家意”不出一草一木的以内就外之学^[20]。“自家意”便是本心,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以外就内之法与孔、孟的正心诚意已不相符。从宋代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到明代继起兴盛的心学,这一儒学的巨大变革不仅仅让心学成为明代后半期的显学,同样也对同时期的“伊儒会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心学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固有的统治思想,对晚明的思想启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心学也导致了社会的精神空虚与危机,为明末清初实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2.2. 中国伊斯兰教的危机及“以儒诠经”的兴起

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在中华大地经过长时期发展,经历了唐宋的初传,元朝的兴盛,到晚明显现出衰落迹象^[21]。虽然明朝开国以来,统治者宣扬对伊斯兰教实施优待政策,但同元朝相比,伊斯兰教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在实际上,明政府对伊斯兰教也实施诸多限制,防止其过分扩张。^[22]就伊斯兰教自身的发展而言,由于明朝开国后推广汉语、实行海禁政策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穆斯林对伊斯兰经典和伊斯兰文化逐渐陌生,阻隔了信仰的传播与继承,由此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教门危机。基于上述原因,明清之际不少有学问的穆斯林学者认为重振伊斯兰教势在必行,他们“从维护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民族生存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汉文译注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23]马注同样也是回族译著家中的重要一位,他们通过利用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以汉语著书立说,“以儒诠经”,大力推动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2.3. 马注自身的学术背景

与四大汉文译著家中的其他三位相比，马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包含宗教内容，而是正统的儒学教育，《清真指南》载：

余早年幼失经训，二亲早捐。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二十而涉宦途，游情诗赋。二十五而访道德，锋棒禅玄。三十而著《经权》，期留青史，亦已编成书，自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清真指南》卷一，《自叙》，第7页）

从如上文本不难看出，马注早期所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基本上不涉及系统的伊斯兰教思想。《清真指南》中也有多处表现他早年间经世致国，救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述：

士君子达则以一身荷天下之任，穷则以一心系道脉之重，虽不同者其事，而同者其心。（《清真指南》卷一，《指南叙》，第3页）

不仅如此，马注还曾游学全国各地，接触了很多伊斯兰教经师。在三十余岁时，马注开始接触到系统的伊斯兰教思想及经典，并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文化，这也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清真指南》载：

予抵燕都，经书丛聚之数，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经问难》一集，凡余答，至圣穆罕默德奉天命答阿布都论乐希之言，事详切，故敢博之。余说疑非。（《清真指南》卷四，《五课》，第122页）

及三十五而访闻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清真指南》卷一，《自叙》，第7页）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马注撰写《清真指南》之前，他的思想来源是多样的。马注既有科举世家^[24]和良好儒家教育的背景，又受到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这为他之后的“以儒诠经”，在《清真指南》中阐发儒学思想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3. 《清真指南》中对儒家思想的具体阐发

3.1. 对本源问题的阐发

长期以来，中国本土哲学在探讨本源问题时，往往着眼于对《周易》或《老子》的诠释。在汤一介先生看来，中国本土哲学对《周易》或《老子》的解释，如王弼《老子旨略》对《老子》的解释、《周易略例》对《周易》的解释、《系辞》对《易经》的解释等，即包含着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两个不同的解释系统，而这两个不同的解释系统则在事实上相互交叉^[25]。《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6]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7]，

以及《周易》所提到的“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8]等，即包含着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交叉的意味。这些材料虽然蕴含着本体论的思想，但其中更多的是生成论，由此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在探讨本源问题时，便习惯于从生成论入手，以生成论的角度去探究本源。

北宋以降，理学家将本体论提高至与生成论并列的地位以应对佛老的挑战，这一思想进路基本上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在《清真指南》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马注自身所具有的理学背景，以及他对本体论和生成论的同等重视。如《清真指南》载：

万物不能自立，必赖于两仪，两仪必本于太极，太极必本于无极……（《清真指南》卷三，《格物》，第77页）

在这里，马注点明了万物的生成途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同时，他也在“无极生太极”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地强调“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将具备一个最终的本源。类似的论述在《清真指南》中还有许多，如：

无极为种，太极为树，人极为果。树生果里，果藏树中，人极虽微，所包者大。（《清真指南》卷五，《忠孝》，第210页）

太极既分，两仪既判，垂照四象，变化四形，乾坤以位，天仙以职。四时不能逃其序，万物不能逃乎数，机不能拟其变，巧不能夺其工……自止一之余光造化一切圣智凡愚、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之本来，所谓无极，无极涵无形之妙。又自智源之理显性理之余光，造化一切无灵觉之本来，是谓太极，太极具有形之理。（《清真指南》卷七，《大能》，第281-282页）

单单就上述内容而言，读者很容易将马注所述与周濂溪《太极图说》相联想。诚然，《清真指南》之于《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29]的说法，就万物生化的路径与本源问题的阐发都颇有一致性。但马注《清真指南》就本源问题的创新之处并不在此，而是将“真主”作为万事万物生成路径中的终极存在。在《格物》章，马注对“真主”作为终极本源作了说明：

无极必本于真一。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形不离性，性不离命，命不离理，理不离真一。真一有万殊之理，而后无极有万殊之命，太极有万殊之性，两仪有万殊之形。（《清真指南》卷三，《格物》，第77页）

马注在承续宋明理学本体论和生成论理路的基础上,将“真一”也即伊斯兰教的“真主”作为终极实体引入本源问题中,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来自于真主,真主是无极之本,才有后来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等万事万物的生发。这是《清真指南》中马注对儒学阐发的重要创新之处。

3.2. 对“圣人”表述的阐发

圣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的范畴,联系着形而上的天道与形而下的人、社会,并将这两个方面统一到一起,成为实现天人合一的中介环节^[30]。而在《清真指南》中,马注将“真主”引入了本源问题的讨论,将“真主”作为化生万物的最高存在。在马注的诠释下,传统的终极存在如“天”等都可以被“真主”所取代,那么,中国哲学中贯通天人的中介“圣人”之概念,其具体意涵在《清真指南》中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如《清真指南》载:

客曰:孔子生于周,圣人生于唐,他隔地远,两相悬绝。孔子之对,或云是佛?曰:异哉!此俗子之见,非可语于至人也。吾教自阿丹没后,钦圣接踵。孔子,儒者之宗也。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设,知天地之终。且纲常人伦之大,陶唐而下,百氏争鸣。孔子扫除异端,赞述前圣,若云大圣是佛,此又异学之见也。况清真证圣,极为要典。穆罕默德不特天仙奉命,神鬼畏避,感应万端。开辟之初,经传纪载,预定朝代征瑞。及其降生,若合符节。所以古今称之为圣,天下信之为圣,圣人自任为圣。(《清真指南》卷二,《客问》,第37页)

在《清真指南》中,马注认为,孔子是主张扫除异端的,因此所谓的圣人不可能来自佛教,因为佛教并不注重纲常人伦。伊斯兰教的经典记载,早在真主开辟天地,造化万物之前,就已经预先前定了圣人穆罕默德的降生。因此,马注意在说明,孔子所说的圣人并不是指佛教的释迦牟尼,而是指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因此,古往今来都将穆罕默德称为圣人,天下才共同承认穆罕默德是圣人。马注通过上述解释,将传统贯通天人的中介——圣人解释为伊斯兰教的至圣穆罕默德,由此,传统儒家中的“天”与“圣人”在《清真指南》中都发生了改变。

3.3. “伊”与“儒”互补互通

主张“伊儒会通”是马注的思想核心之一,在《清真指南》中,马注也用大量论述来说明这一观点。首先,马注认为伊斯兰思想与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说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出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圣道虽同,行于西域,而东土未闻焉。”(《清真指南》卷一,《自叙》,第8页)

回民自入东土,勒籍版图,士农工贾,道同辙合,修齐治平,与儒表里。(《清真指南》卷十,《左道通晓》,第426页)

在这里,“西域圣人之道”与“中国圣人之道”实际上分指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马注认为这两者仅仅是由于流行的地域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无论是在人伦日用还是治国理政上都有相类似之处。其次,马注还主张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

“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清真指南》卷四,《因教》,第142页)

“习经者固不可不通儒。习儒者不能通经,此又终身之大恨。”(《清真指南》卷八,《授书说》,第369页)

“我等生居东土,学难两得。经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经,若秀而不实。苗不秀,其弊也矫,秀不实,其弊也狂。二者之患,皆由所学不精,故邪道得而诱之。今世谓之自暴,后世必遭示罚。”(《清真指南》卷十,《诫律》,第429页)

马注在《清真指南》中形象地将“伊儒”比作“衣食”,二者缺一不可,他主张习经者需通儒,习儒者也需通经,否则不仅会“遗恨”,更生“狂弊”。总的来说,马注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将其与伊斯兰教思想置于平等的地位,并在学习中将两者兼收并蓄。

4. 余论

马注《清真指南》中对儒学的阐发,“以儒诠经”的活动适应了中国的主流社会以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发展需要。《清真指南》对儒学思想的阐发,既没有将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拒之门外,又能够在吸收借鉴儒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中贯通伊斯兰教思想,并在表现形式上灵活变通,以推动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1]因此,《清真指南》所呈现的温和的宗教本土化活动或跨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时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1. [清]马注著,余贞贵标点.清真指南[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第25-28页。(下文引用不再采用脚注)
2. 白寿彝.马注[J].中国穆斯林,1983(01):4-5.
3. 刘玉钊.马注生平及思想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6.
4.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四)——中国穆斯林大学者马注之墓及印章[J].中国穆斯林,2006(02):13-14.
5. 胡玉冰.清代云南籍回族学者马注生平新考[J].回族研究,2013,23(01):56-61.
6.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清代)[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7. 金宜久.中国伊斯兰先贤——马注思想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8. 许淑杰.马注思想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3.
9. 余振贵.文明对话 交流互鉴——《伊儒会通研究》评介[J].中国穆斯林,2015(04):74-75.
10. 季芳桐.“伊儒会通”疏解[J].中国穆斯林,2021(05):25-29.
11. 许淑杰,于鹏翔.试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及马注对此的贡献[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7-10.
12. 郑文宝.回、儒传统伦理会通考略——以马注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01):173-177.
13. 姚文永.清初回儒学者马注对道教的认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103-106.
14. 李培振.试探《清真指南》有关卫生保健的论述[J].中国穆斯林,1989(06):26-27.
15. 许建军.《清真指南》的认主独一思想[J].中国穆斯林,1998(06):13-16.
16. 高占福.从《清真指南》看伊斯兰教的人道思想[J].中国穆斯林,2011(03):9-13.
17. 金宜久.马注论“命”[J].世界宗教研究,2015(06):9-16.
18. 胡玉冰.马注《清真指南》编纂经过及其版本流传述略[J].回族研究,2014(04):82-89.
19. 金宜久.读马复初的《指南要言》——马复初对《清真指南》相关表述的发展[J].青藏高原论坛,2019,7(03):22-28.
20. [明]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63-265.
21. 马晓琴.以儒诠经:伊儒会通的成功典范[J].回族研究,2020,30(02):5-9.
22. 何孝荣,崔靖.明代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分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04):94-99.
23. 马明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05):53-60.
24. 注:马注是名门显族(赛典赤·赡思丁)之后,其近祖四辈均有功名在身。参见刘玉钊.马注的家世及生平[J].回族研究,2007(02):64-74.
25. 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83-90+206.
26.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中华书局,2011,120.
27.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中华书局,2011,113.
28. 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M].商务印书馆,2005,661.
29.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M].中华书局,1990,3-5.
30. 刘旭光.天人中介——试析“圣人”的哲学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29-35+175.
3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22,63.